

“汉语语体 语法研究

Modern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A Perspective from
Formal and Informal Styles



朱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语体语法研究”（09CYY034）结项成果
本书出版获得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学科经费部分资助

汉语语体 语法研究

Modern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A Perspective from
Formal and Informal Styles

朱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 / 朱军著. —南京: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05-19336-1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汉语—语体—研究②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763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名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

著者 朱军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8×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82 千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336-1

定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语体差异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用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有很多经典案例。比如,吕叔湘先生对语体的差异分析专门有一篇文章——《文言和白话》。他把语体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作了分析。在共时平面上,根据口语化程度的差异把语料分为“口语”和“笔语”、“语体文”和“超语体文”,并详尽论述了共时层面这四种不同语体在历时发展中的地位。他对口语语料的语体描述也十分细致。例如《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一文,考察的对象是陈士和评书《聊斋》中的《王者》、《画皮》两篇及老舍的《骆驼祥子》前八章,其中的评书作为基本经过记录的口语语料,老舍小说则是“接近口语的文体”,“代表不太‘文’的书面语”。

关于说话的类型,赵元任先生《汉语口语语法》的分类极为细致。赵先生提出八种情形,简要如下:(1) 照稿子念的独白;(2) 剧本里的对话;(3) 有简单提纲或者没有提纲的即席发言;(4) 连贯的会话,比如电话谈心;(5) 夹杂着动作的独白,有事件影响着或决定着接下去说什么,例如带表演的讲话;(6) 夹杂着动作的对话;(7) 在动作或事件中偶发的话语,例如打牌或者看打球的时候说的话;(8) 在对某一情况做出反应,以及忽然想起什么而情不自禁说出来的“对了!”之类。

不难看出,前辈大师对语体差异的观察涉及多个维度,比如正式程度、准备程度、情景差异、雅俗之别、互动性与非互动性之别,等等;他们的观察也提示我们,这些不同的切入点,无论从哪个方面深入下去,都会有所发现。同时,我们对语法的研究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书面文本的分析。

朱军的这部著作是他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大致为两部分:一是对近年来与语体相关的语法研究的成果和研究思路进行梳理;二是对一些口语构式的用法及浮现规律进行分析。从现象描写的广度来说,几乎触及语体问题的各个侧面。这部著作的长处在于,对用法的辨析吸收了会话分析以及构式语法的观察视角,对现象的描写和解释思路开阔。我相信,这部著作对拓展汉语用法分析的思路会有所启发。

从功能语言学的立场看,不同语体在语言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都有其交际需求动因,语体特征归根到底是由不同的交际功能需求驱动和塑造的。无论从理论解释方面还是从满足应用需求方面看,我们对于汉语语法规律性的探求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细致的观察。

方 梅

2017年7月7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概况 / 001

第一节 什么是语体语法 / 001

一、语体语法概念 / 001

二、理论背景 / 002

第二节 汉语语体的研究现状 / 003

一、语体界定 / 003

二、语体类型与语体渗透 / 004

三、中外语体分类的异同 / 006

第三节 汉语语体语法的研究脉络 / 007

一、理论探索期(1987—1999) / 008

二、现象描写期(2000—2006) / 008

三、理论建构期(2007 年至今) / 010

第四节 本书主要研究视角及相关问题说明 / 012

第二章

汉语“正式—非正式”语体系统 / 017

第一节 正式体与非正式体 / 017

第二节 正式体内部“保守”、“开放”对立特征 / 019

一、两类文言格式在正式体中的适应性 / 019

二、两类欧化格式在正式体中的适应性 / 024

三、两类格式在非正式体中的表现 / 029

四、“保守”与“开放”:正式体内部差异 / 030

第三节 正式体内部其他对立特征 / 032

一、“主观”与“客观” / 032

二、“典雅”与“俗白” / 034

第四节 非正式体内部的对立特征 / 037

一、“有准备”与“无准备” / 037

二、“随意”与“庄重” / 041

三、“互动”与“非互动” / 042

第五节 “正式—非正式”语体系统 / 044

第三章

基于正式度维度的语体语法 / 048

第一节 语体语法的内涵 / 048

一、语法与语体特征的适配 / 048

二、语法浮现与语体的塑造 / 052

第二节 语体语法的外延 / 055

一、不同语体中语法分布差异 / 056

二、不同语体中语法表现差异 / 059

三、不同语体中语法解释差异 / 061

第三节 语体语法的特点 / 065

一、语体语法的全面性 / 065

二、语体语法的层级性 / 068

三、语体语法的协同性 / 070

第四章

语法手段与构式的语体特征 / 073

第一节 完句性、依存性与语体正式度 / 073

一、句子的完句性和依存性 / 073

二、语体正式度与句子依存性 / 074

第二节 “泛句化”手段与非正式体构式 / 077

一、缩略及相关构式 / 077

二、添加、插入及相关构式 / 078

三、转代及相关构式 / 079

四、回声及相关构式 / 081

第三节 “去句化”手段与正式体构式 / 082

一、去时体化及相关构式 / 083

二、去对象化及相关构式 / 084

三、陈述指称化及相关构式 / 085

四、弱谓化、论元槽位丢失及相关构式 / 086

第四节 “语体—构式”语法体系 / 088

第五章

构式多样性与语体分布 / 090

第一节 专题一：有标并列构式的语体适应性 / 090

一、并列式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 091

二、不同性质并列项的语体适应性 / 095

三、多项式并列式的语体适应性 / 101

四、并列连词的位序及其语体适应性 / 107

五、并列项语序规律及其语体特征 / 109

第二节 专题二：转述构式的语体适应性 / 112

一、转述的类型及其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 113

二、转述动词的类型及其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 120

三、转述信息来源及其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情况 / 125

四、转述引导语及其语序在不同语体中的用法特点 / 128

第六章

构式化与语体动因 / 134

第一节 专题一：“动不动”/“动辄”的构式化与语体动因 / 134

一、频度副词“动不动”的构式特点 / 136

二、非正式—正式：“动不动”与“动辄”语体分布的
对立性 / 139

三、从“动不动”/“动辄”的来源看语体对语法的塑造 / 140

第二节 专题二:两种“名+数量”构式及语体动因 / 144

一、两种“名+数量”格式对比 / 145

二、“名+数量”格式两种用法的语体动因 / 153

第三节 专题三:“对了”的两种话语标记用法及语体动因 / 155

一、话语标记“对了 I”的形成途径 / 157

二、话语标记“对了 II”的产生途径及可能解释 / 159

三、话语标记“对了”的形成机制及语体特征 / 162

四、余论 / 166

第七章

构式典型性与语体原型性 / 168

第一节 专题一:“那什么”的话语功能及其非正式体特征 / 168

一、基本用法:作为语阻应对策略的“那什么” / 169

二、浮现用法:作为语篇连贯手段的“那什么” / 172

三、“那什么”的形式演变与功能演变 / 175

四、“那什么”的非正式体特征 / 177

第二节 专题二:“N 中的/之 N”的构式等级及正式体特征 / 179

一、“N 中的/之 N”及其成分的形式、语义特点 / 180

二、“N 中的/之 N”格式的构式化等级 / 184

三、“N 中的/之 N”类格式群的异同 / 186

四、“N 中的/之 N”格式的正式体特征 / 187

五、从“N 中的/之 N”来源看语体对语法的塑造 / 189

第三节 专题三:构式“你 A 你的 X,我 B 我的 Y”及语体复杂性 / 192

一、“你 A 你的(X),我 B 我的(Y)”格式的能产性 / 192

二、“你 A 你的(X),我 B 我的(Y)”的构式化 / 198

三、“你 A 你的(X),我 B 我的(Y)”语体特征的复杂性 / 203

结语 / 208

参考文献 / 214

后记 / 234

第一章 汉语语体语法研究概况

第一节 什么是语体语法

一、语体语法概念

传统的汉语语体研究基本在修辞学、文章学的范畴内。近年来随着功能主义语法研究在国内的盛行,一些学者在语法研究中更加重视语体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以语体为中心的语法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应该是今后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陶红印,1999)、“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张伯江,2005)等观点,给汉语语法学研究带来了一些不同视角,也促使我们在语法研究中更加重视语体问题,而不仅仅把语体看作修辞学的研究课题。

语法主要揭示的是语法单位的结构规律和用法规律,传统认为语法的重要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即能对某种语言甚至是所有语言都具有解释力。但实际上,人们在使用一些普遍语法规律去对照语言事实时,常常会发现有很多规律、规则解释不了的现象。语法规则不但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呈现参数(parameter)变化,而且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体中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别,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语体变量(style variable)。语体变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语法研究中分清材料语体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不同的语体中语法现象的分布存在着差异,语法规律的适用性也有差别,语法具有明显的语体特征,可以说,一种语体有一种语体的“语法”,我们称之为“语体特征语法”或“语体变量语法”,简称“语体语法”(One Style One Grammar,简称 SG)。语体语法研究的特点是:综合考虑语法、语体及其互动因素,从语体的视角透视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律,分清语法事实的语体层次及语体成因,以达到更充分地描写、更准确地解释语法的目的。我们发现,

汉语学界在语法研究中还是注意到语体因素的作用的,但一般把语体因素看作语境或语用的一种顺带提及,没有充分认识到语体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语体语法研究的特点就是充分重视语体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

二、理论背景

语体语法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语法理念,是在功能主义语法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语法思想。其核心的理论观点是:语言具有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功能,语言的结构(包括语法)是在交际使用中磨合成型的,语言的功能因各种内在或外在语境(广义)的差异产生各种变体(语体),语言的结构(包括语法)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具体来说,语法现象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表现或变化会表现出差异性,形式、表义或功能相近的语法现象在特定语体中表现出差异性,一些所谓形式、表义或功能特殊的语法现象具有语体归属性,即只适应特定语体或源于特定语体。

国内外功能语法学者都很重视或进行过语体角度的语法研究,正是这种积累,为语体语法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上的功能语法学者有一些经典研究(转引自张伯江,2005):Hopper(1979),Hopper & Thompson(1980)就是着眼于叙事体结构中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的对立,进而阐述了及物关系(transitivity)的相应语法表现,后文结论为:高及物特征总是伴随在叙述语体的故事主线上。近年来,他们更重视自然口语(spontaneous speech)中的语法表现,如Thompson & Hopper(2001),发现低及物特征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语言是人们用以表达态度、传达情感的主要工具,而不主要是用来叙述事件。

汉语语法学界对语体因素的重视也由来已久,反映了“用法大于语法”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语体语法的正式提出以及受到语法学界极大关注,是与功能语法学者把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关,陶红印(1999)提出“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认为“口语—书面语”简单两分的语体分类模式就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了,并介绍了功能语法学者关于语体分类的几个角度:传媒(medium)和表达方式(mode),有准备的(planned)和无准备的(unplanned),庄重的(formal)和非庄重的(informal),等等。这些基于语法学的多维的语体分类方式为我们进一步从语体角度研究汉语语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和空间,也正是本书所依据的主要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第二节 汉语语体的研究现状

一、语体界定

研究语体语法,必须对语体的概念有所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开始关注语体问题,语体是各种修辞学著作的重要内容,1987年出版了专门的语体研究论文集《语体论》(中国华东修辞学会与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合编),随后也出版了多部语体研究专著。各种著述对语体概念的界定也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几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举如下。

唐松波(1961):语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运用语言特点所形成的体系。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词汇和熟语材料的选择上,其次是语法结构,最后是语音手段的选择……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语音,都有相当的差别,这些差别是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体现出来的。决定这些差别的因素是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因此,语体又叫作功能(或职能)语体。张弓(1963):构成语体基础的是哪些因素呢?大略说来有表达的内容、交际的目的、群众(听众读者)的特点、交际的场合,等等。……这几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说话人、作者根据这些因素,结合实际,选择运用民族语言材料(词句),自然就产生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综合而形成的类型就是“语体”。语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历史发展的;语体不是独立的语言,它是民族语言的支脉。王德春(1987):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内进行交际时,由于不同的交际环境,就形成了一系列运用语言材料的特点,这就是言语的功能变体,简称语体。刘大为(1994)认为语体是言语行为的类型,大致有三个层次:交际需要,由交际需要所选择的语言使用方式也即行为方式,由特定语言使用方式所造成的、话语或文本中的语言形式上的变异特征。李文明(1994)不太赞同把语体看作言语行为的类型,主张把语体看作言语的风格类型。袁晖、李熙宗(2005)认为,语体就是运用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

上述观点在认识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表述上有简单、全面之分。我们在各家分析的基础上,给“语体”作以下界定:

语体与语言表达密不可分,人们只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其言语成品必然属于某一种语体,脱离语体的语言表达是不存在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语言运用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但具体某一次的语言运用又是在一定范围内

进行的,随着范围的相对确定,就形成了不同的交际领域。这些交际领域里使用的语言逐步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成体系的特点,这就是语体。概括地说,语体就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境需要而形成的语言运用特点的体系,它是民族共同语的功能变体。

二、语体类型与语体渗透

语体有各种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类会产生不同的类别。现在的一些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一般把语体简略地分为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每种下面再细分,这种分类较流行且大同小异,我们列举数种如下。

唐松波(1961)把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和文章语体,并认为这种区分是基于语言运用时的一系列差异,不同于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后者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所以口语与谈话语体、书面语与文章语体并非对应关系。这种划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简略的弊端仍然存在。李文明(1994)主张把现代汉语语体分为科学、艺术和应用三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种分体,并认为每类都有相应的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常敬宇(1994)把口语语体分为郑重语体、客气语体、熟稔语体和俚俗语体,并认为不同语体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异。汉语修辞学界常从语体涉及的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如袁晖、李熙宗(2005)在《汉语语体概论》中把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文艺语体和综合语体,再进行下位分类。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和人们对学科的认识一致,缺点在于:不能体现语体自身的特点,有的分类如综合语体合理性也不够。

陶红印(1999)介绍了功能学者关于语体分类的多个角度:传媒(medium)与表达方式(mode);有准备(planned)与无准备(unplanned);庄重的(formal)与非庄重的(informal)。并把语体分为典型语体和非典型语体,这是基于语法差异进行的语体类型分类,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带有显著修辞学色彩的语体分类。

语体分类的主要难点在于语体间的渗透非常普遍,有很多综合语体,按传统的语体类型,不易归类,也说明以某一种标准给语体分类是很困难的。综合语体体现了语体的跨类组合特征,是对常规语篇语体体系的一种偏离,是语篇在“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上的突出表现之一(郑庆君,2006)。也有学者把综合的、跨类的语体现象看作语体变异现象,根据其变异的程度分为局部语体成分变异和全局语体移位(刘桂芳、谭宏姣,2005)。还有学者把综合的语体现象看作语体的动态性,如张滢(2008)运用“拓扑”理论把语体的动态性定义为语体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变异、“偏离”现象,把不同体裁放置在一系列围绕“拓扑参数”的“渐变连续统”上进行定性和描述。还有学者把跨类的语体现象看作语体之间的互动

或交融关系(邓骏捷,2008)。

语体渗透现象主要发生于一些特定体裁中,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文章体裁也五花八门,传统的语体类型难以一一涵括。如征婚启事,典型的征婚启事是公文型应用文语体,基本要求是通俗、准确、简洁,但也有一些征婚启事使用到了其他语体要素,如运用了散文体、小说体、说明体的元素,使征婚启事形式更趋多样化、灵活性,也符合当代人求新求异的心理特征。再如课桌文化,课桌文化有特定的语境特点:匿名性、模仿性、普遍性、随意性、性别化突出,在语体上也有特点,口语、书面语、口语与书面语的杂糅都能够找到例证(王劲松,2005)。电信语言也很有特色,电信语言指的是借助电波媒介、通过语音播送的方式传递、交流现实社会生活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这种体裁在语体上很难归类,具有语体渗透的特点,如在这种体裁中使用口语词、也多用叠音词,多使用短句、但不用倒装句(盛永生,2000),即这种体裁既具有口语典型特点,也具备书面语的典型特点。说明语言也具有多体化的特征,说明语域中的语场、语旨、语式决定了说明语针对不同的受众、媒体而运用多种多样的语体要素来达到“促销”的表达效果,其交际功能的发展促成了多体化的特征(曾立英,2002)。

语体渗透还常发生于一些新型体裁中,如网络语言。有人把网络语言看作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一种语体,也有人把它看作谈话语体的网上功能变体(孙鲁痕,2007)。网络语言成分复杂,新鲜元素不断涌现,给其语体定位带来很大困难。如网络语言中有一种特殊的文体“群言体”,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阐释,根据其特点和功能的不同,又有采访体、比较体和娱乐体的差异(霍四通,2005),它们的语体特征差别是明显的。

针对传统语体分类遇到的困难,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一些很有新意的语体分类方法,力图更好地解释语体跨类和渗透现象,具有启发意义:郑颐寿(2004)认识到单维度的语体分类缺点明显,主张运用数学原理解决语体的分类问题,提出了“语体平面”的概念。具体做法是先根据功能把语体分为艺术语体、融合语体、实用语体,以之为纵轴,再根据媒介把语体分为口语、书语、电语,以之为横轴,纵横结合,构成“语体平面”,这个平面分为12语体区,可以分析各种语体现象,力图让各种体裁都能在“语体平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蔡晖(2004)也认为传统的语体分类方法存在“削足适履”的遗憾,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典型范畴理论来分析功能语体分类,提出功能语体分类是对语言现象的范畴化,是以原型成员为中心的模糊集合,为语体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中外语体分类的异同

国外的语体分类方法与汉语的语体分类方法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共同点体现在都有口语与书面语的分类,但在具体语体的分类以及语体涉及的范围方面存在着差异。下文以韩语、英语、法语的语体分类为例,比较汉语与这些语言语体分类的差异。

韩语语体的分类与汉语不太相同,其标准多样,得出的语体类型也多样化。根据“层次”分为社会语体学与个人语体学,根据“时间”分为共时语体学与历时语体学,根据对象分为文艺语体学和使用语体学,根据“方法”分为统计语体学、心理语体学和语言语体学,根据性质分为语言学语体学、文学语体学和综合语体学,根据“语言单位”分为声音语体学、词汇语体学、句段语体学和篇章语体学(崔晋硕,1999)。

英语的语体分类常从语体变异的角度着手。Labov(1966)在研究纽约话时,提出了语体的选择取决于说话人对自己语言的注意程度(attention),依照发音人对话语的注意力,从读辨音词对到随意谈话排列成一个注意力逐步减弱的“语体连续体”(style continuum);Labov 还认为被调查者对语体的使用与场合有关,越是在正式的场合,说话人注意力越集中在他们的说话方式上,这时他们越是倾向于使用正式的语体,反之,说话人就会倾向于使用非正式体。20 世纪 70 年代,Labov 的“注意力”学术受到质疑,研究者发现在实践采访对话中注意程度难以客观量化。后来的学者力图弥补“注意力”语体理论的不足,如 Bell(1984)提出的“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同的听众会影响说话人对语音、词汇、语法的选择,这种理论认为,语体就是说话人根据不同的听众进行选择的结果。听众设计理论比注意力理论更充分地解释了语言变异。同听众设计理论不同,Arnold(1993)等人提出的“说话人设计”(speaker design)理论更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包含了主动性,语体变异或选择不仅仅被看作灵活的现象,而且被看作积极创造表现和重造说话人认同的一种资源,如在论文答辩时,答辩人会选择庄重、严肃的语体,表明自己是认真的人,并希望通过使用这种语体获得社会认同(徐大明,2006)。

针对语言材料的语体分类也不限于口语与书面语。如美国语言学家 Martin Joos (1962)根据语言的正式程度把英语语体分为五种形式:intimate (亲密体)、casual (随便体)、consultative (商议体)、formal (正规体)、frozen (官文样式)。各种形式在语言材料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

Bally(1909)的法语语体学研究是以“心理主义”为基础的,对具有感情附加

色彩的词语进行语体研究,以“自然的感情特征”、“间接效果”作为语体分析和语体分类的基准。Bally 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语体研究产生影响,如 Akhmanova (阿赫玛诺娃)运用感情特征作为主要的语体分类标准(程雨民,2004)。

从以上介绍可见,外语语体分类同汉语语体分类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从语体涉及的范围看,外语一般大于汉语,如英语的语体研究中,把语言的社会变体(分类)、语境变体(分类)、地域变体(分类)都看作语体问题(裴文,2000),而在汉语中这些分别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方言学的研究范围,与语体研究关系不大;从分类的方式看,汉语语体研究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分类的模式相对单一,局限于口语语体、书面语体的分类;外语语体的分类方式和角度则更多样化,如韩语;从分类的标准看,汉语语体的分类标准以功能为主,书面语体的下位分类基本以文体(体裁)为标准,外语语体的分类标准更为多样化,有以语言特征为标准的,也有以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心理为标准的,还有以语境为标准的,等等。国外的语体分类研究给我们很多启发,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吸收其优点,可以促进汉语语体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汉语语体语法的研究脉络

国外早期的语体语法研究零星地出现在文献中,不成系统。其源于 Charles Bally 的《法语语体学》(1909),该书以词语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涉及个别语法结构。英语语体学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真正开始,主要经历了语体分类研究(如 Strang,1962;Matin Joos,1962)、联系语境的研究(如 Gregory,1967)、分析与语体有关的语言特征研究(如 Crystal and Davy,1969;Labov,1966,1972;程雨民,2004;裴文,2000)、语体变异研究(如 Bell,1984,2001;Arnold,1993;Campbell-Kibler,2000)几个阶段,各阶段研究都涉及一些语法现象的分析,但语法都不是研究的核心与出发点。而我国学者程雨民(1983)对美国学者 Ross(1979)的一组英语句子调查情况进行的语体差异分析,倒是以语法为出发点的研究,程文认为复杂的语体变体与语法变体相结合,导致语言的情况异常复杂,呈现“核心—中间—边缘”的多样化关系。

汉语语体语法的研究是以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吕叔湘译)为起点的,这是第一部专门从语体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但作者受写作目的(帮助外国人学汉语)的限制,并没有有意识地区分或比较口语语法与书面语语法,名为汉语口语语法,其实基本也就是汉语语法。在这前后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在进行具体语法问题研究时,有时会顺带提及其语体归属或语体特

征,但也仅此而已。李裕德(1985)的《科技汉语语法》也是全面地描写了汉语语法,但其语料都是取自科技语体。朱德熙(1987)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对汉语语体语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根据研究的阶段性特点,把汉语语体语法研究分为三个时段。

一、理论探索期(1987—1999)

这个时期的语体语法研究强调语法研究中分清材料语体层次的重要性以及语体多视角分类的语法意义。朱德熙(1987)指出汉语语法研究选择语料的标准过宽,一方面与作者取舍语料不慎重有关,另一方面反映现代汉语标准语本身的不稳定,所以文章提出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胡明扬(1993)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组成成分十分驳杂,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就是一些不同语体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糅合而成,所以在语法研究中如果能够对反映不同语体不同特点的语法现象、反映不同语言系统不同特点的语法现象适当地分别处理,可以减少困难。陶红印(1999)认为著述一部内容上有保证的、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认为唯一的语法(the grammar)概念最好用多种语法(grammar)概念替代,语法研究就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因为只有系统地研究清楚了多种(可能永远不是全部)主要语体中的语言现象,才能描述汉语不同语体之间的共性有多少、差异有多大,才能更有效地回答涉及汉语全貌的重大语法理论问题。

这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如郑远汉(1987)讨论了汉语各类句式与语体之间的适应关系,所选语体类型是科学体、谈话体和艺术体,这是讨论句式的语体分布较早也是较全面的论述。陈建民(1991)将口语句子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比较短小、停顿多,比较简略,结构上松散,词序比较自由。朱翊晖(1998)讨论了公文语体中 NP 结构的几种主题化转移方式、具体特点以及功能,认为在语篇上能够达到句际衔接更加紧凑的目的。以上研究修辞学和语体学色彩明显强于语法学色彩。另外,廖秋忠(1992)的篇章语法具有先导性,很多地方涉及语体语法的研究,但它并不是专门讨论语体语法的著作。

二、现象描写期(2000—2006)

这个时期研究成果丰富,但普遍侧重对具体语言现象的描写,缺少理论探索。可归纳为以下五个具体方面。

一是分析语法现象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和适应情况的研究。如吴云、刘顺(2000)讨论了句成分从缺与语体之间的关系;吴仲华(2005)把“之一”当作一种